

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丛书

M & C

新传播革命

李良荣 编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丛书

M&C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理政推动国家执政方式现代化研究”

（项目编号：14BXW053）研究成果

新传播革命

李良荣 编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传播革命/李良荣编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2
(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11784-4

I. 新… II. 李… III. 传播媒介-关系-国家-行政管理-研究 IV. ①G206.2②D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7226号

新传播革命

李良荣 编著
责任编辑/高 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176千
201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1784-4/G·1516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李良荣*

新媒体正在广泛、深刻、持久、全方位地改变着世界。

新媒体凭借何等魔力能以如此广度、深度、速度改变世界？无他，新媒体对人类的本质意义在于通过技术把赋予民众的传播权利(Right)变成了传播权力(Power)，真正实现了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公开发布任何信息和意见。由此，公共传播由过去被极少数人所垄断的局面演绎成为全民狂欢、众声喧哗，宣示了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从而，信息流量、信息流速、信息流域、信息流向都以几何级数增大、增强，水银泻地般浸润着、冲击着、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的方方面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必然引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调整。当今中国的种种变化，都是这种深层社会关系调整的表征；而且必须顺应这种关系的调整才能窥得未来的方向。

在新媒体引发当代中国的种种变化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新媒体为中国的各级政府塑造了全新的执政环境。

这种全新的执政环境以一句形象的话表达就是：过去政府“说一

* 李良荣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不二”，现在大众“说三道四”；过去政府“吆五喝六”，现在大众“七嘴八舌”。这种改变，表明过去“一种意见”“一言堂”“舆论一律”的“一元化”执政格局已经不复存在，显现出政府的一元意志与社会各种群体利益的多元诉求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如何降低摩擦、推动社会理性进步？这其中，传播的力量不容忽视。

政府必须保证政令畅通才能顺利行政，这需要传播的力量。

当今中国早已形成多元化的利益格局。针对政府政策，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诉求。有的诉求，过去只是私底下的“牢骚”，现在已经成为公开的表达，甚至向政府叫板。这样一来，政府必须在与众多意见的博弈与协商中才能达成基本的政治共识、社会共识。这也需要传播的力量。

然而，这也是党和政府自建国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新挑战。面对这样新的执政环境，我们的党和政府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政治改革新目标。这一“现代化”被认为是继“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目标与路径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系列丛书就是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中心议题是讨论新媒体传播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服务于党和政府在新的执政环境下治国理政方略的变革。

这是新的课题、新的探索。我们的书中观点难免有不成熟之处，也可能会有偏颇，但我们会继续前行。

李良荣

2014年10月26日

第一章 新变革 / 1

论新传播革命(李良荣 郑 雯) / 1

互联网与大众政治的勃兴(李良荣 张 盛) / 13

互联网与民粹主义流行(李良荣 徐晓东) / 20

新意见领袖论(李良荣 张 莹) / 29

第二章 新挑战 / 36

大数据、云存储与关键数据安全

——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家信息安全疆界变迁带来新威胁(杨 珉
沈 逸) / 36

网络中意识形态新特征、新问题与新思路(李瑞昌) / 43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政治：新媒体发展与国家治理态势分析
(周海晏) / 49

网络群体性事件态势(李良荣 郑 雯) / 58

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机理：“传播属性”与“事件属性”双重建模研究
——基于 195 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李良荣 郑 雯
张 盛) / 72

第三章 新治理 / 97

争夺传播主导权：应对新传播革命挑战(李良荣 沈 逸) / 97

网络传播的治理与社会冲突的化解：“阿拉伯之春”“伦敦之夏”
“华尔街之秋”与“莫斯科之冬”比较分析(李良荣 沈 逸) / 105

“三善”应对新媒体的关键群体：意见领袖群体的演进与应对

(沈逸 桂勇) / 113

中国推动建立“全球网络空间新秩序”的若干建议

(李良荣 沈逸) / 124

中国应力主倡导建立“全球网络空间互不瞄准协议”

(李良荣 陆志安 方师师) / 128

三管齐下,治理互联网(李良荣 周海晏) / 132

第四章 新媒体 / 137

主体性：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传媒新角色(李良荣 方师师) / 137

新老媒体结合,造就舆论新格局(李良荣 张媛) / 150

不失时机,推动传媒体制改革(李良荣 张涛甫) / 159

传统媒体再造(章平) / 167

新媒体管理的国际经验与代表案例(沈逸) / 174

平等、互动、迅速和公开

——西方各国政治领导人如何有效利用新媒体与民众沟通

(沈国麟) / 183

新媒体研究总报告：善待 善用 善管——代跋(李良荣) / 191

第一章

新 变 革

论新传播革命^①

李良荣 郑 雯

人类社会绵延至今,经历了四次^②意义重大的传播革命。

第一次传播革命是文字的发明、使用。人类文明第一次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通之于万里,推之于百年”,并保证了信息在传播中不被扭曲、变形、重组和丢失,引导人类由“野蛮时代”迈向“文明时代”。

第二次传播革命是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不仅给中国,也给欧洲和整个世界文明带来了曙光。报纸、杂志、书籍等大众媒介迅速普及,在当时的欧洲直接引发了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曾经只在上流社会流转的竹简、帛书等复杂的书写媒介,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知识的垄断被打破。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加速了封建主义的没落和资本主

^① 原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12年第4期。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JZD0026)“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引导和防控对策研究”成果之一。

^② 不同于其他一些学者“五次传播革命”的观点,笔者认为:语言传播的诞生,不能作为人类特有的传播文明进步列入第一次传播革命。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显示,动物也有丰富多样的发达的“语言”。

义的诞生。

第三次传播革命是电报的发明,而后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一系列模拟式电子传播技术与媒介相继出现,挣脱了印刷传播时代必不可少的物质传播束缚,使得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空前迅疾,范围空前广泛,内容空前丰富,复制扩散和保存信息的能力空前增强。电报的发明主要提供了长距离即时点对点传播技术。随后的广播、电视将点对点技术发展点对点技术,即时的全球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信息供给达到空前丰富的程度。

而第四次传播革命,亦即互联网技术的推广与使用,相比于前三次传播革命,不仅在传播载体、传播介质上更加先进,实现了数字、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影像等多种传播方式的统一数字化处理;更以其交互性传播模式,使得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传统关系面临巨大转变,传播权力面临深层次的结构调整。

克林顿因为一个网民自办的小小的网站被弹劾,奥巴马利用社会化网络在大选中获胜,中国每年发生数以百计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影响政府决策,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中东、北非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运动通过网络动员直接颠覆了政权。这一次的传播革命,早已不仅仅是公众个人的媒介使用问题,抑或是推进文明扩散的问题,这是一场个人与国家、“自媒体”与“大众媒体”关系的重新定义。如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所言^①,因特网不仅仅是一个便利的应用工具,它适应了信息时代出现的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因为这些运动发现了组织起来的合适媒介,他们发展并打开了社会变革的新途径,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因特网作为优势媒介的地位。

这场空前浩荡的传播革命正处于“革命”进程当中,它催生了一个全新的传播环境,将人类文明推向更高级阶段的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

^① 转引自蔡文之:《网络传播革命:权力与规制》一书“媒体推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治理提出紧迫的新课题。

一、传播权力的回归——新传播革命的本质

前三次的传播革命成果,既包括为人类共享的愈发先进的人类文明,也始终贯穿着不断增强的资本、权力控制。国家基于知识、技术与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从传播革命中获得的权力资源和治理资源远远多于社会。在当代,“公民拥有言论、出版自由”,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但事实上,相对于庞大的国家组织、雄厚的资本控制、复杂的媒体机构,普通公民根本没有可能与之抗衡,所谓公民言论、出版自由只是空洞的条文,至多是在点对点的交往中的窃窃私语。传播的权力或被国家垄断,或受资本控制,或是政府、资本合谋共享,公众有传播的权利,却没有传播的权力,大众传媒沦为权力、资本奴役公众的工具。从《单向度的人》到《娱乐至死》,传播学批判学派对此种异化现象有过深刻的揭示和持续的批判。

现在,第四次传播革命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过“自我赋权”落到实处。过去表面上拥有传播权利的普通公民,现在借助互联网传播、新媒体技术,在知情、表达方面享受到很大程度的言论自由权利;同时,通过多种渠道的“公共空间”“自媒体”延伸了传播的“象征性权力”。

来源于大众的“媒介权力”本身,因不具备国家暴力机器背景,本身的“权力”就是一种象征性权力,即约翰·B·汤普森^①所说的,“运用象征性形式干预事件进程的能力,影响他人行为而创造事件的能力,采用的手段是象征性形式的生产和传播。”无论是“孙志刚事件”“随手拍解救拐卖儿童”“宜黄强拆”等表现出正面力量的象征性权力,还是“铜须案”“刘涌案”等事件中干预司法公正、侵犯公民权利的负面象征性权力,都在这场互联网的传播革命中重新回归大众本身。普通公众在一

^① 转引自邵培仁:《传播民主真的能够实现吗?——媒介象征性权力的转移与话语民主的幻想》,《现代传播》,2011年第3期。

定层面真正成了传播革命的推动者、参与者和决定性力量。

新传播革命象征性权力的回归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信源蜂窝式增长，保障知情权回归

第四次传播革命首先打破的是传统大众媒体对信息源的掌控。一方面，传统新闻报道有着相对固定的信息源，如政府、大企业家、社会精英、专家、机构等，普通民众很难成为新闻源，而只能作为“沉默的受众”存在；另一方面，掌握着关键信息的信源，要想发出声音，使大众知晓，也只能依赖于传统大众媒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捧红”了媒介的权力。

如今，互联网赋予信源蜂窝式的增长可能，4.85亿^①中国网民每个人手里都有信息。理论上，全世界只要联通网络的国家地区，每一个人都是信源。信源蜂窝式高速膨胀的结果，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亮在“阳光下”；损人利己的部分大企业、大资本家，时时刻刻要受到民众监督；甚至个人的隐私有时也在道德的追问中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曾经，我们必须通过 CNN 了解海湾战争，现在，世界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有当时在场的人们实时发布；曾经，《焦点访谈》不报道，大众都在“放心”地吃着金华火腿，现在，哪怕美国的传统媒体鸦雀无声 5 天，大洋另一岸的我们还是能起劲地讨论“占领华尔街”。一部联网的手机可以让每个人走遍世界，公民知情权在互联网传播革命中回归。

第二，“自媒体”即时化传播，促进表达权回归

区别于前几次传播革命特殊的传播主体，第四次传播革命中，表达权最大的特征是“自媒体”表达。谢因·波曼在《自媒体》中提出，自媒体，即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以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与新闻的途径^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0 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显示：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 亿个博客用户。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

^① 数据来源：2011 年 6 月 CNNIC 报告。

^② 转引自邓若伊：《论自媒体传播与公共领域的变动》，《现代传播》，2011 年第 4 期。

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 300 多万条^①。这是一个庞大而独立的自媒体群,每个人在即时化的海量信息传播中,模糊了个人媒体和传统大众媒体的边界。新浪“名人排行榜”目前排名第一的姚晨,微博粉丝量 16 123 398^②(数据截至 2012 年 1 月),榜单上粉丝超过 300 万的名人有 139 个;而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整个中国,发行量在 300 万以上的报纸,也只有《参考消息》一家。

除了名人自身作为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自媒体”表达观点和传播信息以外,普通公民在维权抗争、监督政府、观点交流方面亦表现出巨大的活力。信息的即时传播、即时扩散不仅在信息选择上成就了普通公民“想说就说”的表达权,也在信息解释、观点呈现上,挣脱传统媒体报道框架,给予了公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权利,由此深刻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结构。

第三,全面信息监管失效,“权利”上升为“权力”

国内外不少学者指出,未来社会,权力斗争会越来越集中于对获得与传播知识权力的控制,控制传播系统的斗争将成为一切斗争的核心。

在知情权和表达权空前发达的互联网时代,自上而下全面的国家信息监管基本失效。碎片化实时发布的信息,国内国外此起彼伏的声音,精通电脑技术能绕过监管手段的越来越聪明的大众,使得国家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大为减弱。2009 年伊朗大选,国家实行严厉的网络管制,甚至暂停手机短信,以阻止反对派利用网络造势。结果,民众依然使用 twitter 突破封锁、获取信息;而美国国务院甚至为此专门向 twitter 公司发了一封特殊的信件,请求他们推迟维修服务的时间,以保证伊朗民众大选前的信息沟通。包括 2010 年的中东、北非革命,无不告诉我们,国家试图封锁信息、全面管控言论表达的时代已经一去

^① 潘祥辉:《传播个人主义:“自媒体”革命的政治社会学解读》,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6566,2012 年 1 月 12 日。

^② 数据来源:新浪微博,http://weibo.com/yaochen,2012 年 1 月 16 日。

不复返。井喷式的信息增长,使国家在“信息权力”上逐渐式微,也预示着拥有注意力资源的公民在“信息权力”上逐渐强势。正是因为这种权力、影响力的上升,促使国家、政府在各个方面的重视舆论压力、改进管理模式。

二、“去中心化、再中心化”——新传播革命的基本特征

“去中心化一再中心化”,是第四次传播革命的基本特征。詹姆斯·凯伦在《媒体与权力》中指出,“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从而在现存的主导型维权结构内部引发日趋激化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新媒体有时候会绕开已经建立起来的媒体传输机构,发布遭到禁止或限制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控制社会知识的等级制度。”^①

“去中心化”,指互联网技术本质上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传播技术,具有天然的反中心取向。这一次传播革命,本质上是传播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的全民化,通过解构国家对传播权力的垄断,使传播力量由国家转移到社会,从而削弱国家在信息、技术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因而,它所带来的不是国家组织和治理能力的强化,相反,是对国家组织和治理能力的严重挑战。

“再中心化”,指随着信息发布门槛的持续降低,网络空间的信息供给量迅速超过了单一个体独立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力。在如此浩瀚的信息浪潮中,公民开始委托新人,通过“意见领袖”筛选信息,研判事实,进行新一轮的“中心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能够获得足够信任的新行为体,将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个体会“授权”这些中心,以信任和采用这些中心提供的解释框架代替个体独立思考为表征,代理个体处理庞大的信息。同时,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社会中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结构,通过网络重构行动中心、话语中心、舆论中心。在整个第四次传播革命

^① [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过程中，“去中心化—再中心化”这个动态而辩证的过程，在重构国家权力结构方面，伴随始终。

第一，意见领袖阶层崛起，重塑思想中心

中国的新意见领袖阶层主要由活跃的思想精英、作家艺术家以及草根领袖三部分组成。每一位意见领袖都拥有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一千多万的“粉丝”，他们为网民设置议程，提供对事件的解释，引导舆论，在相当程度上把控着公共事务的话语权。

新传播革命使原来不可能在现实中聚合的意见领袖们通过网络走到一起。这些个人精力极端旺盛又拥有广泛社会资源、具有公共关怀的意见领袖们，在互联网上形成精神聚合，并因为这种介入公共事件的可能性，越发被激发出参与社会管理、参与公共表达的热情。不隶属于主流传播领域的公共意见领袖们，为普通公民提供更新、更有趣、更深入、更易接受的思想观点，坐拥千万“粉丝”指点江山，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重塑了新的思想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新意见领袖群体并非天然都与官方对立，但这样一股力量的存在，绝对不容管理者忽视。

第二，社会关系洗牌，重构行动中心

传统社会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体制，相对固化着个体的社交空间、行动空间。新的社会化媒体，打破了曾经的单一组织中心系统，构筑起一个庞大的“强关系”“弱关系”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推动了社会交往的新模式，也从根本上打破了单一的“社交圈”，重构了社会关系。曾经需要由单位、街道组织的活动、行动，现在完全可以用网络替代，甚至爆发出了更大的组织能量。就组织方式上来说，意见领袖拥有庞大的追随群，往往一呼百应；网络论坛中的“菜鸟”网民们也可以随时发起各种大范围的“社会行动”，从捐赠、公益、比赛、演出到聚餐、抗议、哀悼、打拐，使用个人手机、微博、qq、微信联系他人，速度前所未有的，启动一场对话、讨论直至大规模抗议的能力呈几何级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数不清的群体性事件，由网络肇始，走进现实社

会,演变成一个又一个公共事件、公民行动。过去酝酿社会事件,必须有主流媒体“曝光”,媒体可见度越高,社会运动的成功性越大。如今,“阿拉伯之春”通过新媒体颠覆政权,“伦敦之夏”绕过国家通讯系统的黑莓手机自组织传播信息,“华尔街之秋”在网络上发起抗议,“俄罗斯之冬”第一次运用社交网站组织反对行动。在国内,厦门PX事件通过外地号码手机组织“散步”示威,香港大游行运用 Youtube 发布动员短片,“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行动完全由素不相识的微博网友共同行动……那么多的事件虽然诉求各不相同,但都首先依托互联网构建的新的行动中心,独立承担起整个事件的动员与组织。新媒体以其自身的公信力在这些社会行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话语空间拓展,重建舆论中心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新传播革命“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特征,打破的是主流媒体的单一话语空间,重塑的是一个新的依托于网络的“公共舆论中心”。

新传播革命以前,“舆情”就是来自传统媒体的报道。所谓媒介建构的现实,报道什么,社会就是什么,普通大众没有能力质疑,在媒体相对独立的国家中,政府也难有途径质疑。现在,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诞生,它沟通虚拟与现实、官方与民间、公民行动与高层决策,形成多方互动,构建了一个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与行动的新“舆论中心”。中国近几年来,“两会问政”“个税修改法案”等公共话题讨论,在传统媒体话语空间之外,搭建了一个新“舆论场”。同时,不止于静态的舆论呈现,从“躲猫猫”事件到“郭美美”事件,从上海“11·15”大火到温州“7·25”动车追尾,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舆论风暴,发挥着深刻的社会影响力。

三、新执政环境——新传播革命的基本挑战

第四次传播革命通过传播权力的回归、“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过程,改变了权力结构的不平衡,打破了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削弱了国

家的权力根基,大大提升了社会、个人面对国家的博弈能力,从而孕育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生态。新传播革命为整个执政环境带来的变化,为国家治理、执政方针带来的挑战,是研究新传播革命的重中之重。

1. “全景化围观”,政府疲于应对

新传播革命带来执政环境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政府处在了全民全时空的“全景化围观”中。过去,政府控制媒体、媒体控制受众,“我让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什么;不让你知道,你就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网络提供了一种“多数人观看多数人”^①的结构,既不同于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里的“少数人看多数人”,也和极权时代的“多数人监视多数人”不一样。公权力尤其在这种信息民主化的过程中成为被围观的对象。而这种围观,基于庞大的网民基础无时无刻细致入微地观察监督,将政府置于了一个紧张的“全景化围观”环境中。政府在“眼睛无处不在,耳朵无处不在,嘴巴无处不在”的全景化围观中执政。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信息垄断不复存在,政府、传统媒体越来越后知后觉,被民众牵着鼻子走。这不仅表现在政府决策议程越发被动,也表现在决策选择越发受制。面对喷涌而出、诉求各异的网络舆论,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全力以赴,应对公共危机事件,采取很多临时应急措施,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政府只能疲于奔命,四处救火,大大影响了有效的长远规划。同时,一有事故发生,面对群情激昂的民意,马上对相关官员撤职查办,为平息民愤,甚至法院等司法机关有时也不得不违背司法独立原则,服从“民意审判”。

2. “一半冰山,一半火焰”,舆论极化难控制

《新周刊》曾经刊出一篇文章,解读《中国社会的温差》——“一半是冰山,一半是火焰”^②。这篇文章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冷漠有时,大

① 熊培云:《好社会不会从天而降》,《新周刊》,2011年11月1日。

② 何雄飞:《中国社会的温差》,《新周刊》,2011年11月1日。

爱有时。微博里是一个世界一种生活,《新闻联播》里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

笔者发现,第四次传播革命呈现给我们的民意,也存在着“一半冰山、一半火焰”的状况。截至2011年6月的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表明,目前中国4.58亿网民中,只有22.2%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超过75%的网民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我们能够看到、听到的很多网络民意,也许不能代表主流价值观,也许并不代表先进文化。当然,中产阶级作为网络问政、参政议政的重要社会力量正在崛起,但这其中,不乏大量的“乌合之众”。他们包含“沉默的大多数”,也包含着如学者勒庞描述的“情感幼稚、道德败坏、智力低下”的人群。大量精英分子如冰山一般“冷眼旁观”,而底层大众却无法控制地“一点就燃”。正因为此,网络舆论常常存在极化的危险,上文提到的盲目跟风、疲于被动应对的政府,也可能“跟”错对象,弄出问题。

3. 多元思潮涌现,主流意识形态受冲击

作为自由表达的空间,互联网让各种思潮有了公开显示的场所,目前,有三股思潮特别盛行。一股是自由主义思潮,由一批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西方的民主自由,要求扩大民主基础,开放言论和报禁,力推私有化。还有两股是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由草根网民倡导。狭隘民族主义主要针对国际事务,主张一切凡批评中国、损害中国的言行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击,从而批评中国政府“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都是“缩头乌龟”,甚至“卖国政府”;民粹主义本质上就是仇官仇富仇权威,提倡绝对平均主义。多元思潮的泛滥使本来就模糊不清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加混沌,造成当前“主旋律不明,噪音四起”的局面,大大复杂了政府执政环境。

近年来迅速上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将政府决策失误、执法变形、官员腐败、司法不公等问题一次次推向风口浪尖,消解着政府公信力。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不相信媒体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